

瘟疫，人类的影子？

——广东抗“非典”纪实

杨黎光

进入 2003 年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找一本书，书名叫《未来的灾难》，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它出版于 1999 年，由于当时只发行了几千册，找到它费了好多的时间。这既不是一本小说，也不是一本报告文学，而是一本被评价为“科学前沿的报告”，书的内容可以从它的副题——“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而窥见一斑。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书的核心内容是这样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瘟疫’一词唤起的是对黑死病的想象。自从这种疾病在欧洲杀死数千万人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六个世纪，它的名字仍能让人战栗。但是蹂躏整个人类的远不止这一种瘟疫。……医学的飞速发展，已将众多的疾病从世界上放逐，许多顽疾也得到相应的控制。但最近的证据表明，我们有可能失败，瘟疫流行的时代也许并未一去不复返……”

作者用了洋洋几十万字的篇幅分析了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被

杨黎光，1954 年生，安徽安庆人，现在《深圳特区报》任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灵魂的家园》等。本文原载《中国作家》2003 年第 8 期。

其称为有可能引起“瘟疫复活”的事实后，最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瘟疫流行的时代是否会卷土重来？这实在是一个人类必须正视的大事。”

听起来好像有点危言耸听，但由于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关于死亡”的写作选题，他所谈论的内容引起我的关注，所以就找来找来读一读。

像是一种预兆似的，当我正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种并非耸人听闻的事就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地发生了。它既不是作者在书中所担心的一种抗药性很强的“超级病毒”的产生，也不是艾滋病爆发性的蔓延，更不是近年来多次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的扩散，也不是鼠疫、登革热、霍乱等人类已知的传染病爆发流行，而是一种我们从未认识的新疾病，悄然地开始攻击人类。

我们还不能把它称为“瘟疫”。因为全世界才感染了 8500 多人，死亡 500 多人。但是 2003 年的春天，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有着计算、通讯能力和创造性的人）与最简单的生物（只是一个基因片断的病毒）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人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种疾病，中国把它叫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叫做“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简称“SARS”。

于是，作为一名记者，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知道该出门了，尽管满世界都是口罩。那天，我离开家之前对妻子说，我要去广州。妻说，广州“非典”闹得那么凶，人家躲都躲不及，你还往广州跑干什么？我说，我就是为了“非典”去的。妻不解地望着我。我解释说，我要去采访“非典”。妻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能不去吗？我说，不能。说完我就出门了。

这么多年来我写过许多大要案，也曾在九八抗洪中蹚着齐腰深的江水去采访。前两年为采写有“世纪大盗”之称的香港黑社

会头子张子强，我多次独自一人去香港、澳门，妻从来没有担心过。但是，这一次她心存深深的担忧。为什么？因为面对着的“非典”病毒，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又会何时攻击我们。

但是我走了，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从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的佛山，一步一步地走去，一直走进遭受“非典”重创的广州。这一走，一直到这部作品的完成回到家中，一共用了 42 天。

这 42 天中，总共采访了近 40 个单位，120 多人。

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必须要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万倍，才可以看见的变异的“冠状病毒”。

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

我来到广东省佛山市的那一天，是一个阴雨天。

佛山在广州的西南约 16 公里处，我从广东省卫生厅出来直奔佛山，车程也就半个多小时，但在佛山城内寻找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国际上统称为“CDC”）却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由于对“非典”病毒几乎是一无所知，当我在老城区那潮湿陈旧的街道里穿行时，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为什么最早的“非典”病人在这里被发现？我站在老街上那经年累月的老榕树下避雨，雨水顺着树叶滴到我的身上，我突然跳起来，好像那沾满尘土的雨水会带着“非典”病毒侵袭我。

佛山，是一个有着 1300 多年历史的古老城镇。据传，佛山一名的由来，是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当地居民在塔坡岗掘得三尊小铜佛，于是人们把塔坡岗称为佛山。现在的佛山市老城区仍称为“禅城”。佛山，在历史上商业鼎盛时期，曾和汉口、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镇。

“非典”和古老有联系吗？后来证明我当时这个想法太无知。

我找到位于佛山市普群南路的“疾控中心”时，已是中午 12

点 18 分，所谓“疾控中心”就是过去人们所称的防疫站。中心主任黄祖星正在办公室等我。我们都没有顾上吃饭，就开始了我的采访。

随着黄祖星的介绍，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中国第一例回顾性的“非典”病人出现的情景。

2002 年 11 月 16 日 广东省佛山市

2002 年的 11 月 16 日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将会永远记载在世界医学史上。

当天，有一位发烧不退并伴有腹泻的患者走进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位患者姓庞，男性，45 岁，是一位农村最基层的村干部。我之所以要特意说明一下他的身份，是因为他所患的这种病，寻找病源，职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庞姓患者不是佛山市区人，几天前开始发烧，且伴有咳嗽，发烧的热度并不太高，咳嗽也只是干咳，没有痰，所有症状都并不太严重。刚开始以为是感冒，曾在佛山石湾镇医院就诊。但治疗了几天不见好转，并且开始腹泻，病情有加重的趋势。于是就在家人的陪同下，转到佛山市最大也是医疗条件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

当我从老城区的“疾控中心”赶到新城区的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时，我仿佛穿行了这座城市几十年的时空，因为呈现在我的面前的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综合医院。整个医院的建筑都是崭新的，而且非常气派和宏伟，但它是一座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的周明主任和院 ICU（重症监护室）当初医治庞姓患者的吴敏主任，向我介绍了病人入院以及后来病情发展的情况。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后，见病人腹泻严重，并伴有高烧不退，一开始怀疑是急性肠炎，于是收进了感染科。治了两天，发

现病人出现肺部感染，咳嗽加重，并且呼吸急促，一般正常人每分钟呼吸在 18 次左右，可这位病人每分钟呼吸达 40 多次，就像刚刚一口气爬了 10 层楼般的喘气，出现典型的“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症状。紧接着，病人出现氧饱和度低，面色发绀（即面部发紫），处在一种严重缺氧状态。X 光透视肺部出现了阴影，表明两肺都受到了损伤。病人病情恶化，赶紧送到医院 ICU（重症监护室）抢救。

当时医生先怀疑是伤寒，因为病人表现又发烧，又发寒，有些像伤寒的症状。我们对伤寒都不陌生，因为它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了，流行病学上叫传统传染病，至今它仍列在《传染病防治法》列支的 35 种传染病之中。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已经知道伤寒是由伤寒杆菌感染所致。这种病菌一般可以在病人的血液中找到，通过对病人的血培养，没有检验出伤寒杆菌。

医生又怀疑是禽流感。

禽流感，是一种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家禽和野禽的一种从呼吸病到严重性败血症等多种症状的综合病症，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鸡瘟”。禽流感也是一种古老的禽类传染病，我所查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 1878 年爆发于意大利的禽流感，当时的家禽染病后有 80% 以上在几天内死去。禽流感主要通过染病家禽的分泌物和粪便等感染家禽，一般较少传染给人类。但 1997 年在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人类的禽流感，造成 6 人死亡，而且病人都正当壮年。后来研究得知，造成人类感染的是一种叫做 H5N1 的禽流感病毒。为了切断禽流感的传染源，当年香港痛下决心，宰杀了 300 万只鸡。2001 年 5 月和今年初，香港又相继发生了散发的禽流感病例，但未造成感染流行。

佛山离香港不远，几乎每天都有香港人往来于香港与佛山之间。怀疑病人感染上禽流感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医生给病人做了采咽拭子培养化验，即用棉签从病人的咽喉部采集分泌物，进

行培养，然后化验。结果没有发现能传染给人的 H5N1 禽流感病毒。

香港大学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H5N1 病毒的基因完全来源于鸟类，由于这种病毒的基因组中不含有人类的基因，因此禽流感一般不会人传染给人。

庞姓患者病情的发展，后来完全排除了是禽流感，因为他先后感染了 5 位家人。

11 月 27 日，一直陪护庞姓患者的舅母病倒了，也是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

11 月 30 日，舅母的丈夫病倒了，症状仍然一样；

12 月 1 日，庞姓患者自己的妻子也因发烧进了医院；

12 月 4 日，被感染了舅母 21 岁的女儿也病倒了。

所有的人，病情基本一致，只是症状程度轻重不同而已，都是发烧不退，咳嗽，肺部有阴影。

病得最重的是陪护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舅母，她和庞姓患者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呼吸系统衰竭症状，被紧急送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和庞姓患者在一间 ICU 病室里进行抢救。

经验告诉医务人员，这不是一般的肺炎，并且具有传染性，医院方面一边告诫医护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感染措施，一边向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派人来到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调查。

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各种传染病的疫情进行监测和对流行病学的调查。它是从原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分离重组的。我国的卫生防疫机构是 1954 年开始逐步建立的，当时学苏联叫做“卫生防疫站”，国家一级的叫做“预防医学科学院”。后来根据 199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从 2000 年开始将原卫生防疫站一分为二，将

防疫站的卫生监督 and 监测职能分离。卫生监督部分成立了“卫生监督所”，行使行政卫生监督职能；疫情监测部分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 cdc，是国际上的统称。

这家人出现的病情具有传染病的特征，所以属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责，根据国家下发的《传染病防治法》，任何部门发现怀疑有传染病迹象都必须向各级“疾控中心”报告。

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中心副主任和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和疾病控制工作的科长赶到了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发现这种病有家庭聚集传播性，就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分析，排除了伤寒、流感、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但这种病和《传染病防治法》中所规定的 35 种必须上报的传染病任何一种都不吻合，所以当时就把它当作呼吸道传染病，对医务人员采取了必要的防感染措施。后来在抢救治疗中，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没有发生一起医务人员被感染的个案。

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直到广东“非典”大爆发前，再也没有发现类似的病人，庞姓患者虽然先后传染了 4 个家人，但其几个孩子，包括在其生病和住院期间经常来看望他，并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弟弟，都没有被感染。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5 位病人都相继康复出院了。

后来有一位从省里请来为庞姓患者会诊过的医师，参加了省卫生厅组织的“不明原因肺炎专家调查组”，在赴中山市调查中回忆起这一病例，并调来病历比较，症状与“非典”相同，所以把这称为中国第一例回顾性发现的“非典”病人。当然这位专家当时赴佛山会诊时，也没有诊断出庞姓患者就是“非典”，因为那时就是这位传染病方面的专家也还没有认识清楚，有一种新型传染病发生，这种新型传染病就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人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是不断的发现，逐步的认识，然后再得出科学结论。这个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者，因此社会就要为此

付出代价。

紧接着在广东省的河源市发生的事情，就推动了专家们对这种新型传染病的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第一例报告发现的“非典”病人

我是从佛山市直接驱车到达河源市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无论其经济基础、文化语言、地貌气候包括饮食习惯都不相同。

河源市距佛山市有约两百公里之遥。佛山市在广州的西南，而河源市在广州的东北面。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基本上是个消费性的城市，境内地势多为丘陵和平原。改革开放以来佛山的经济发展很快，境内有很多外商办的工厂，交通非常便利，除了火车，公路交通特别发达，境内有多条高速公路通过。前往香港、澳门、珠海、深圳、广州这些中心城市都非常方便。所以，境内流动人员很多，外来人口甚至超过本地人口。《未来的灾难》一书作者说，“如果没有高速公路，卡车和喷气式飞机，艾滋病仍会继续藏在中非的一些小村庄里”。这就是说，人口流动量的大小，对于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将起一定的作用。河源境内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流动和外来人口相对佛山要少得多，因此，传入疾病的几率相对也应该小一些。

河源 79.4% 面积为山地，为了要保护境内的万绿湖、新丰江水源，严格控制有污染源的工厂发展，所以这里山清水秀，一条穿城而过的新丰江江水碧绿清澈。河源是一个有较少污染的城市，其气候与佛山也有很大差别。我离开佛山的时候，那种湿热的亚热带气候，使我感到憋闷而且身上的汗水总干不了。可车一进河源境内，一股清新凉爽的新风扑面而来，让人感到精神为之一振。

但，就是在这儿发现了中国第一例报告“非典”病人。

2002 年 12 月 15 日 广东省河源市

一个月后，2002年 12月 15 日晚上 11 点多钟，一位黄姓患者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当时高烧，满面通红连脖子都是红的，呼吸困难，全身酸痛。他是一位厨师，35 岁，身体非常健壮，在深圳的一家酒楼工作。5 天前开始发烧，在深圳福田区医院看过以后，病情没有好转，为节省医疗费用就回到了老家紫金县柏埔镇，在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医生见他高烧、全身酸痛，认为他是重感冒，给他开了退烧药和感冒药，还打了退烧针。第二天，黄姓患者不但病情没有减轻，还出现了呕吐，干咳，而且高烧已经到 40 多度，卫生院医生建议家人赶快送河源市人民医院看急诊。

急诊科医生将其收进了内一病区住院，负责黄姓患者的是呼吸科医生叶钧强。病人住院后，继续高烧，咳嗽，呼吸更加困难。

第二天一早，叶钧强医生走进病房查房，只见病人头上、胳膊、大腿、股沟处都放着冰袋。由于各种退烧药都无效，夜班医生只得用冰袋给其物理降温。尽管如此，病人仍然高烧 40 度不退。拍 X 光片检查，发现两肺都有阴影，表现出较重的肺部感染。

经过两天的治疗，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呼吸已经非常困难，咳嗽严重到不能说话的地步。两肺阴影进一步扩大。

经过联系，决定转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治疗。呼吸内科的主任黄文杰博士，就是后来广东省抗击“非典”专家组最初的 6 名专家之一。

当天下午 5 点半，河源市人民医院用救护车将黄姓患者送往广州，叶钧强医生随车护送。由于病人高烧，一路上叶钧强不停地让救护车停下，给病人买冰水喝降温。当天晚上，约 9 点钟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黄姓患者，是在深圳发病回到家乡的，紧

接着下面发生的一例“非典”病人，就是本地人了。

我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文字将两座城市的环境做一比较，是因为凡一新型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都要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找源头，分析最早发现“非典”病人的环境外因，寻找共同之处，对流行病学的调查是有意义的。

那天送完黄姓患者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后，回到河源市已经是夜里快3点了，叶钧强医生没有睡几个小时又起来上班了，因为这一段时间感冒病人特别多，感冒属于呼吸道感染，是呼吸内科的专业范围，因此呼吸内科的人手就特别的紧张。所以，叶钧强还得准时上班。

叶钧强来到科里，发现又来了一位郭姓患者，也是男性，40岁，是个个体出租车司机，他是河源市区人。郭姓患者的一切症状和昨天送走的黄姓患者差不多，也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但郭姓患者不认识黄姓患者，两人也没有接触史。而黄姓患者与佛山的那位庞姓患者更是八杆子也打不着。他们都是相互独立，各自发病的“非典”病人。后来通过更深入的采访，我了解到这些城市包括广州，最初发病的“非典”病人，他们相互之间都没有接触史。我纳闷，为什么在广东好多个城市，这些相互没有因果关系的人突然间都一起发病了呢？我还了解到，当疫情最初爆发起来时，有62.9%的病人找不到直接的传染源，也就是找不到是谁把“非典”传染给了他。

郭姓病人住院后病情发展很快。当天晚上，先发寒后高烧，同时开始咳嗽。后经气管镜检查，发现支气管内有“玻璃样改变”，不仅年轻的叶钧强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同在呼吸科年过花甲的谢教授也没有见过这种病例。谢教授与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同学联系，这位同学让他把病人送到呼研所来。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如今已经闻名全国的钟南山院士。

它的全称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

作为主治医生，叶钧强第二次送病人去广州。

后来我在采访叶钧强时，他摇着头说：“怎么也没想到，我成了第一个被‘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送郭姓患者去广州的那天是12月21日的上午，那天叶钧强刚下夜班，由于科里的人手紧张，只得利用休息时间再送患者去广州。郭姓患者一路干咳不停，叶钧强不停地俯身用听诊器为其听心肺音。车到广州，叶钧强将郭姓患者送到设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然后马上就返回了河源。

那天，叶钧强感到特别的累，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第二天叶医生照常回科里上班。当时正是感冒流行季节，医院里每天发烧病人不少。感冒属于呼吸道感染疾病，所以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叶钧强每天像蜜蜂一样忙进忙出。

12月24日的晚上，忙了一天的叶钧强下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是本院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他的妻子是叶钧强科里的护士，怀了4个多月的身孕，现在突然发烧，来电话请教叶钧强，对孕妇如何慎重用药。叶钧强谈了自己的意见。当时，他以为这位护士也是感冒了。

叶钧强医生是本地人，上海铁道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到河源人民医院。他性格开朗，爱好广泛，爱人也是本院的护士，婚后有一个两岁的儿子。那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好朋友，叶钧强和他聊了好久，一时兴起，两人还在家里唱起了卡拉OK。他根本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异样。

当天下半夜的时候，叶钧强突然梦见自己单衣薄衫地走进了深夜中的原野，隆冬的寒风吹得他直打颤，最后竟从睡梦中冷得醒来。发寒以后，紧接着发热，妻子用体温表给他量，开始体温并不太高，到天快亮时已经是39度多的高烧了。妻子立即陪着他到医院去检查。验血：白血球不高，拍片：两肺没有改变，以为

也是感冒，当作上呼吸道感染来治疗。

12月26号，叶钧强开始咳嗽，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经过科里的专家谢教授的检查，决定立即住院。

当天晚上5点多钟叶钧强住进了自己担任住院医生的呼吸科。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同为咳嗽、气促，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30多次，这使叶钧强总在喘气，说话都很困难。最为让人焦心的是，肺部炎症发展很快，第二天已是两肺阴影。

这时候，一个情况让医院上下都紧张起来，就在那两天曾经参与对黄姓病人和郭姓病人治疗的医护人员，先后有8人病倒了，甚至包括门诊药房的一名药剂师，其中有两位护士是孕妇，包括那天晚上给叶钧强打电话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妻子，也是其中之一。症状全部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阴影。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在内一科（也即呼吸科）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无论症状轻重，全部收进住院隔离。

当时院内组织了多次会诊，但由于检测不出致病原，所以意见不一，但都认同是一种传染性的肺炎。采用常规性的治疗方案，效果不明显。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让医院领导更为紧张，说送去广州的两个病人，一个已经死亡，一个病危上了呼吸机。院领导一边在院内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给医护人员发了一些抗炎抗病毒的药，如罗红霉素等；一边向河源市卫生局汇报。河源市卫生局决定向广东省卫生厅报告，请求派出专家来河源会诊调查。

河源市人民医院当晚就拟出了给省卫生厅的报告，这份报告在抗“非典”中，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因此有专家保存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我得到的也是一份复印件，特录如下：

省卫生厅医政处：

2002年12月中旬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科收治了2例重症肺部感染的病人。因病情重，先后转送上级医院（其中1例送广州军区总医院，1例送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出诊医生回来后也得了“肺部感染”，内一科先后又有7位医护得了“肺部感染”，局部具有一定的流行传染性。据说送上级医院那两位病人，该疾病广州方面都诊断不明确，一位已死亡，另一位病情危重，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我们医院发病的8位医护人员其中3位较重，出现了重症肺部感染，目前肺部感染病因、致病原不明，我院大会诊的意见初步定为军团菌、病毒性或支原体性感染性大，但我院实验室条件所限，不能检测出这几种致病原。治疗上给予抗炎、抗病毒、抗结核等各种治疗措施，治疗效果不理想，故特请省厅能组织有关专家前来本院指导诊治。

我院发病的共8位医护人员，其中男3人，女5人，病情都有以下共同特点：1. 青壮年临床一线医务人员，既往体健；2. 都在同一科室工作及同一个时期发病；3. 临床表现的症状、体征、X线及化验检查都相似：发病前都有感冒症状，逐渐出现畏寒、高烧不退，咳嗽咯少量白色痰，其中2例咯少量血丝痰，双下肺听诊少量湿啰音，但无空洞、气胸、胸积液及心包积液改变。化验室检查血象白细胞不高，血、痰、骨髓培养未发现致病菌。

申请单位 河源市人民医院

2003. 1. 2

据我所知，虽然报告的时间是2003年1月2日，但起草这份报告是1月1日的深夜。

2003年1月2日 广东省卫生厅

2003年的元月2日上午，新年第一天上班，广东省卫生厅收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报告。当时厅长黄庆道正在主持召开厅办公会，副厅长王智琼拿到传真以后立即在会上通报了此事。黄庆道厅长听后，意识到这桩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召集分管副厅长和相关科室开会，决定立即组织专家组到河源，并且当天就要出发。

省卫生厅医政处的同志，一边通知有关专家到卫生厅集中，一边打电话到收治两名病人的医院了解情况。结果得知，两名病人虽然都病情严重上了呼吸机，但无一例死亡。关于“有病人死亡”的传言，恐怕是这次“非典”爆发中最早的不实传言。这种不实传言后来在不少城市都有发生，并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

当天下午2点多专家们在省卫生厅510小会议室集中，翻阅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传真件，然后很快乘上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救护车就出发了。

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由流行病学调查组和临床专家组组成。临床专家组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副所长肖正伦教授、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邓子德副教授组成，流行病学调查组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防治研究所所长罗会明、副所长彭国文及微生物检验所的钟豪杰组成。

专家组到达河源时已经天黑了，没有顾上吃饭，临床专家组立即进入病房会诊，流行病学调查组也马上进行环境调查和对病人进行血清采样。河源市卫生局和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参与了调查和讨论。

忙完这些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简单地吃了一点饭，专家组的同志汇集在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议室讨论，大家讨论了很久，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但不符合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当中所规

定的 35 种传染性疾病中的一种。对于有人怀疑是“军团病”，专家们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军团病，是由嗜肺军团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症状类似于肺炎，表现为发冷、不适、肌痛、头晕、头痛，并有烦躁、呼吸困难、胸痛。90%以上的患者体温迅速上升，咳嗽并伴有粘痰。重症病人可发生肝功能变化，甚至肾衰竭。通常，军团病的爆发时间多在仲夏和初秋，主要是在封闭的中央空调房间里。军团病的易感人群多为老年人、吸烟者、慢性肺部疾患者，同时，免疫功能低下者也易感染。

军团病是近几十年在美国发现的一种传染性疾病。1976年美国费城退伍军人协会在费城召开会员会议，会后参加会议的人员中爆发急性发热性呼吸道疾病。经研究发现有一种细菌，由于它最初感染的是一群军人，故命名为“嗜肺军团菌”。随后，许多有关细菌暂被列入这一属，且追溯研究（即像我们今天回顾发现佛山的“非典”病例一样），发现早在1943年在军队中即有军团病的病例。现已提出了超过30种军团杆菌，至少19种是人类肺炎的病原。其中最常见病原体为嗜肺军团菌。

军团菌，主要孳生在蓄水系统、空调用水等潮湿的地方。后来军团病已经不仅仅是在军人中发生，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发现了军团病，这是和我们的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有关。因为，城市的现代化大型建筑物中，通常装备中央空调系统、冷热水管道以及加湿器，如果水源被军团菌污染，建筑物中的人员就可能感染军团病。专家告诫说，这也是我国发展中的现代化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我从网上就查到这样一份资料：1977年到1999年，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查了该市14家四星级、五星级大饭店，发现这些饭店中空调冷却塔中都存在军团菌。这项调查显示：军团菌普遍存在于空调冷却塔中，已对饭店工作人员的健康造成威胁。

那么河源市的病人是因军团菌感染吗？专家们，尤其是临床专家们认为，病人的症状与体征不支持感染军团菌的推断。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12 点多，没有形成结论性的意见。

就在专家们集中于河源人民医院讨论时，由于前面提到的不实传言，引起河源市面上发生了抢购罗红霉素、抗病毒类药等。并且谣言越传越奇，说什么河源发“人瘟”了，在市民中造成一定的恐慌。这恐怕是这次抗“非典”中，发生最早的“抢购风”。当天，由于专家们乘坐的是车身印有“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字样的救护车，甚至有人上来询问，“你们是不是来调查发‘人瘟’的”。为此，当天深夜近 1 点钟，河源市市长在自己的家中紧急召开分管副市长、卫生局长、教育局长和媒体领导的联席会议，研究消除谣言的对策。

第二天一早 7 点多钟，专家们又到组长肖正伦的房间继续讨论，形成了初步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不长，也照录如下：

关于赴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诊调查初步工作报告

工作组一行 6 人于 2003 年 1 月 2 日傍晚到达河源市人民医院。河源市卫生局、市人民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领导和人员座谈讨论，查阅所有住院病人全部病历，对住院病人逐一进行询问调查并作体格检查，对内一区及传染病区环境作现场察看。

初步认为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区医务人员近期出现的病例为一起病因未明的肺炎局部爆发（考虑为非典型病原体所致）。从 2002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6 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内一区医务人员发生病因未明的肺炎共 6 例。病人共同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肺部片状模糊阴影和血象白细胞计数无明显升高。

目前在住院的 5 例病人中，4 例病情好转并稳定，发热清退，咳嗽减轻。1 例仍有发热和呼吸道症状，在进一步观察治疗之中。

从12月27日至今，在病区及密切接触者中未见同样新发病例，无疫情扩散迹象。目前已对病人采取治疗措施，并对病房环境进行消毒处理，防止新发病例。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收取部分病人血清拟作支原体、流感病毒抗体等检测。

广东省卫生厅赴河源会诊调查专家组

（签名）萧正伦

二〇〇三年元月三日

专家组带着这份《调查报告》，回省卫生厅汇报。

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是中国医务界最早为抗击“非典”付出代价的医院。叶钧强医生成为中国第一位被“非典”病人感染的医生，后来病危也送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和他亲手送来的黄姓患者同在一个病区抢救。被传染的5位护士，其中有两位是孕妇，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了保住肚子里的孩子，很多药都不敢吃，靠自己年轻的身体硬挺了过来。我到河源采访时，她还没有临盆，我默默为她顺产祈祷。还有两位护士，新闻媒体上找不到她们的名字。没人知道，她们不仅是中国最早受到感染的护士，还是最早为北京感染上“非典”的老军医姜素椿贡献了血清的“非典”恢复病人。她们，一个叫肖冬梅，一个叫黄晓琴，两人都很年轻。我在河源人民医院见到她们时，问，“传染上‘非典’后有什么感想？”她们说，“感谢领导措施及时，保住了我们的命，恢复后又回到科室参加救治别的‘非典’病人。”

叶钧强医生经过九死一生后，对领导有一个请求，让他到抢救他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进修，他要提高自己的医术，继续为抗击“非典”而奋斗。目前他已在进修之中。

行为和语言都很朴素，朴素的美拨动着我的心弦。